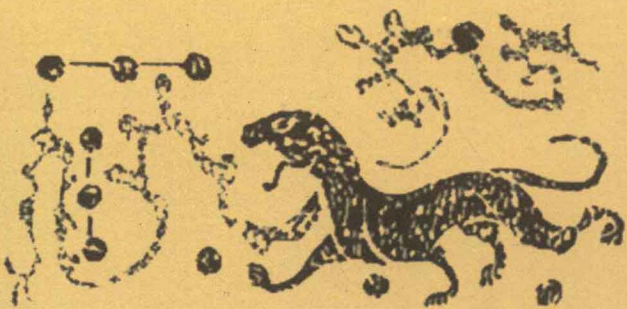


汉文化研究丛书



民间信仰 与汉代生肖图像研究

郑先兴 著

MINJIANXINYANG YU
HANDAI SHENGXIAOTUXIANG YANJIU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MINJIANXINYANG YU HANDAISHENGXIAO TUXIANGYANJIU

民间信仰与汉代生肖图像研究

郑先兴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信仰与汉代生肖图像研究/郑先兴著.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649-0782-2

I. ①民… II. ①郑…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7618 号

责任编辑 苗 卉 张玉梅
责任校对 廖存非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101 号	邮编: 45001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1)
● 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及其研究趋向	(1)
● 汉画像的研究现状及其民间信仰性质	(7)
● 十二生肖的研究现状及其文化意蕴	(12)
鼠	(20)
● “狗咬耗子”:汉代民众生活的现实问题	(20)
● “仓中鼠”:汉代民众生活的物质诉求	(23)
● “老鼠嫁女”:汉代的生存现状及其人生理念	(26)
● “鼠咬天开”:汉代的创世及其再生观念	(30)
牛	(35)
● 牛耕与牛车:先进生产力的载体	(35)
● 斗牛与牛首:远古部族争斗与融合的表征	(41)
● 牛神与牛奶:精神的信仰与物质的食粮	(45)
● 牛郎与金牛:汉代牛的理念及其饲养	(52)
虎	(55)
● 猎虎与戏虎:汉代虎信仰的现实基础	(55)
● 部族与再生:汉代虎信仰的历史记忆	(59)
● 人文与天文:汉代虎信仰的方位观念	(70)
● 巫术与科学:汉代虎信仰的矛盾性	(72)

兔	(76)
● 捕食兔:汉代兔信仰的现实基础	(76)
● 捣药兔:汉代的长生向往和历史部族记忆	(81)
● 月中兔:汉代的月相天文观念	(89)
● 兔儿爷:汉代兔信仰的活化态	(91)
龙	(92)
● 具象与想象:汉代民间龙信仰的现实基础	(92)
● 记忆与期盼:汉代龙信仰的历史与现实诉求	(98)
● 人文与天文:汉代龙信仰的方位观念	(103)
● 生机与张力:汉代龙信仰的精神抗争	(105)
蛇	(113)
● 珥蛇与操蛇:汉代蛇信仰的英雄意蕴	(113)
● 交尾蛇:汉代蛇信仰的性意识与生殖观念	(119)
● 玄武蛇:汉代蛇信仰的远古部族记忆与重生期盼	(125)
● 升仙蛇:汉代蛇信仰的精神向往	(135)
马	(140)
● 耕战:汉代马信仰的物质基础	(140)
● 富贵:汉代马信仰的制度养成	(146)
● 相驭:汉代马信仰的知识张扬	(151)
● 智能:汉代马信仰的精神诉求	(152)
羊	(157)
● 美:汉代民间羊信仰的物质需要	(157)
● 姜:汉代羊信仰的生殖崇拜	(162)
● 羌:汉代羊信仰的部族记忆	(168)
● 祥:汉代羊信仰的精神诉求	(172)
● 法:汉代羊信仰的制度传说	(174)
猴	(177)
● 性与性别:汉代猴信仰的生物学知识	(177)

- 偷人抢女:汉代猴信仰的婚俗遗风 (179)
- 时运封官:汉代民间猴信仰的社会理念 (184)

鸡 (190)

- 食与玩:汉代鸡信仰的现实基础 (190)
- 部族与官职:汉代鸡信仰的政治观念 (201)
- 给予与交合:汉代鸡信仰的重生期盼 (212)
- 日月与方位:汉代鸡信仰的知识诉求 (230)

狗 (242)

- “走狗烹”:汉代狗信仰的工具理性 (242)
- 槃瓠狗:汉代狗信仰的婚俗传说 (250)
- 天狗劫:汉代狗信仰的知识诉求 (252)

猪 (259)

- 食肉与财富:汉代猪的社会学价值 (259)
- “虎猪戏”与“斗猪”图:遗留在汉画像上有关远古野猪家养部族信息的记忆 (266)
- “猪龙”与“猪神”:财富诉求与文明创制者崇拜的表征 (273)
- 名号与刘姓:汉代猪信仰的历史遗存 (278)

跋 (281)

绪

● 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及其研究趋向

一直以来,汉代民间信仰是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资深的老一辈学者中如顾颉刚、杨树达、孙作云等,都曾经予以论析;现代活跃在学术界的著名学者王子今、彭卫、孙家洲、葛兆光也曾给予了研究;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学子如沈刚、贾艳红、李秋香等则借此研究获得了学位。那么,汉代民间信仰研究为什么会成为学术热点?研究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不足?换句话说,其研究的趋向在哪里?总之,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及其研究现状如何?虽然对此有些学者也做过论析,但是对于汉代民间信仰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为此,笔者试图尝试分析,以促进汉代民间信仰研究的深入。

(一) 汉代民间信仰研究的原因

汉代民间信仰研究之所以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有着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这是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折射。1916~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胡适等文化旗手的引领下,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纛,主张“新道德”“新文学”“新伦理”,提倡白话文,重视民众文化的发展和提高。1918年,北京大学有刘半农、顾颉刚等人主办了《民俗》杂志,调研民间文化,整理民间诗歌。以此为契机,一个关心民众疾苦、研究民间信仰的社会思潮蓬勃兴起。其进一步的发展,从现实政治来说是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从学术思想来说,则是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方兴未艾。嗣后,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广大民众贫困疾苦生活的现实问题解决为结合点,积极构建崭新的民间信仰,从而调动了广大劳动民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积极地投身到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独裁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是与之相应的精神文化却已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生活需要。因而在一个稍微富裕的社会中构建合理的民间信仰,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学者义不容辞的义务。这样,民间信仰的研究,随着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无论在启蒙时期,或是在民主民族革命时期,或是在现代的建设时期,都必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其次,这是“新史学”思潮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新史学》,批评传统史学是二十四姓家谱,提倡研究民众生活的“国民史学”;1922年,梁启超又提出文化史研究的主张,提倡史学研究要关注民众生活史而不是只关注政治史。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张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史学研究应该研究民众生活。这样,关注民众生活、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史逐渐成为新史学研究的主体。当然,其时的民间信仰研究的主题主要是在阶级与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起义斗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文革”影射史学的反思,文化史研究又被学者提出,号召研究社会下层的生活史。由此说来,研究民众生活史和民间信仰,一直就是上个世纪以来“新史学”思潮的基本要求和特征。

再次,这是汉代历史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汉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轴心时期的晚期。轴心时期是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里,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如印度、希腊、罗马、中国等等世界上文化较早发达的地区,都涌现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家,他们整理之前历史发展的经验,撰写成各种各样的、影响今后历史发展的经典著作。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经典著作,大多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才是中国的轴心期。但是,众所周知,经过秦火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是由汉代经师的传诵和整理而得以流布的。所以,汉代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民间信仰而言,汉代是承继和整理了远古以来的精华,才逐渐形成了本土的宗教文化即原始的道教和原始的儒教,并引进了佛教文化。所以,汉代的民间信仰不仅是极其丰富和繁杂,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汉代民间信仰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锁钥。

最后,这是新资料和新观念的启发。所谓新资料,是说在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新出土的汉代简帛资料和画像资料,为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所谓新观念,是指西方史学相关的研究如《剑桥秦汉史》的编者鲁惟一、余英时等人的论著传入为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了理论

和方法的支持。所以,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就成为今天历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二) 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范式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民间信仰研究范式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而言,学术研究范式取决于学术研究的维度。考虑到民间信仰的研究主要是在宗教学、哲学、民俗学学科中进行,由此,总览汉代民间信仰研究实践,其研究范式主要就是宗教史——宗教学、思想史——哲学、社会史——民俗学、美术史——文艺学几种形式。

宗教史——宗教学的研究范式。宗教史学可以说是探究民间信仰的基本路径。在研究实践中,有关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大多附属在道教史、佛教史的通史性研究之中。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单行本《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和卿希泰主编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其中都设有专章论述汉代的早期道教发展的形态。由汤用彤先生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 1991 年版)的第一部分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一卷,专门论述了秦汉时期佛教传入的情况。张岂之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的第四编“宗教篇”专门论述了“儒学的宗教学化倾向”、早期道教和佛教传入的情形。专门探讨汉代民间信仰的论著,比较早期的研究论著是 1930 年宋佩韦所著的《东汉之宗教》,该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何炳松所主编《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一种。《东汉之宗教》分为四编,前三编分别论述东汉的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发展,最后一编则论述三教的关系。作为通俗读本,该书在论述东汉宗教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汉代民间信仰,比如谶纬、五斗米教等等。最近的研究则由汪小洋博士的学位论文《汉画像石宗教思想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4 年 5 月),该论文借助于汉画像石材料,对汉代墓葬绘画、尤其是西王母、射鸟、动物图像所蕴含的宗教观念予以挖掘梳理,揭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思想史——哲学的研究范式。民间信仰的旨趣在于宗教,其基石则是思想,而其研究可以在哲学中展开。在新时期以来的汉代思想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如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其副标题为“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可以说是首开民间信仰与知识、思想相结合研究的先河。其中的第一卷第三编第一节专门论述传世文献、汉画像和铜镜中所反映的“一般信仰”亦即民间信仰。从知识的角度考察汉代民间信仰的,有钟肇鹏的《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详细

论述汉代的谶纬信仰,王铁的《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主要论述了汉代的天文、数术、养生和谶纬信仰。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汉代民间信仰的,张岂之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秦汉卷》第一卷第一编“社会篇”设有“信仰世界与社会习俗”章节,专门就汉代民间的“五德终始”、“富贵、侯王、神仙、长寿”、“卜祀”、“婚丧礼俗”和“精神风貌”等等信仰状况予以考察分析,龚鹏程的《汉代思潮》(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论述了汉代的“自然气感”、“风俗美善”、“太平道”和“游民”等信仰问题。

社会史——社会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从静态来看,民间信仰的载体是民众,属于社会民俗学的范畴;从动态来看,民俗文化又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所以,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又可以从社会史或风俗史——民俗学的维度展开。如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第六章“两汉民间信仰与乡村神祇崇拜”,指出,两汉民间信仰的神祇主要要司命、灶神、门神、四神和鬼怪,其特征在于实用、泛神崇拜、地方性;乡村巫与巫师盛行,实行巫蛊、祝诅和降神术;乡村还流行着禁忌和择日习俗。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俗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九章“信仰风俗”,论述了秦汉时期的神灵(自然神、人格神、职能神、动物神、祖先)、鬼怪、方术(卜筮、相术、占梦、望气、风角、日月星占、谶纬和巫术)、道教和佛教等等。贾艳红博士沿袭其导师马新的思路,所撰写的学位论文《汉代民间信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年 4 月),以“汉代的神祇世界”、“沟通神人的媒介——巫”和“芸芸众生的信仰”三个篇幅专题论析了汉代的民间信仰。李秋香博士的学位论文《文化认同与文化控制:秦汉民间信仰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年 4 月)从民间信仰的功能文化认同(包括地域、族群和历史)和文化控制(包括禁忌、巫术、儒家伦理和宗教)两个方面,考察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形态。沈刚博士的《民间信仰与汉代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报告 2006 年 12 月)对汉代民间信仰作了更为深刻的论析,指出,汉代社会的民间信仰源自于东周之后的社会秩序混乱和秦代国家的规范,其形式有先兆类、禳灾类、祈福类、节庆与习俗类、祝诅类等,同时也表现为地域性层级性,方士、巫蛊乃至于国家的活动都制约着民间信仰,而民间信仰对于社会经济主要起着负面的影响。张文安博士的《周秦两汉的神仙信仰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年 5 月)考察了神仙信仰由民间方士到君王再到方士的发展历程,分析了神仙信仰与方术、养生和道教产生的关系。姚圣良博士的《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齐鲁书社 2009 年版)则考察了神仙信仰与文学的关系。白春霞的《战国秦汉时期龙蛇信仰的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年 6 月)对民间信仰的偶像龙、蛇予以了论述。胡迪的《汉代禁忌探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4月)全面考察了汉代的生活生活(服饰、饮食、住宅、婚嫁、丧葬)、生产(农耕、渔业、养殖)以及政务、军事等方面的禁忌,并分析其原因与影响。王光华的《简帛禁忌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利用简帛资料考察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日常生活(包括时日、方位和行为)、月令和军事等禁忌情况。宋燕鹏的《两汉南北朝时期淫祠》(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专门考察汉代的淫祠。

美术史——文艺民俗学的研究范式。20世纪以来,反映汉代民间社会的砖石画像资料大量涌现,更多的学者借助于文艺学的理论挖掘汉画像中的民间信仰内涵。有的对汉代民间信仰的偶像作了专题性的研究。比如陈履生的《神画主神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主要论述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两对主神图像特征;李淦的《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则探究了汉代河南、山东、陕北、四川的汉砖石西王母图像以及铜镜中的西王母图像。牛天伟、金爱秀的《汉画神灵图像考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则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汉代民间信仰中的伏羲女娲、西王母、气象神灵(雷神、风伯、雨师、虹神、河伯)、镇宅守墓神灵(神荼郁垒、宗布神、獬豸神)、农事神灵(蚕马神、牛神)、战神蚩尤、祥瑞神灵(熊、虎、凤凰、麒麟)、天象神灵(日月、天门悬壁)等等偶像图像。郑先兴的《汉画像的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借助于“原型分析”的理论,指出汉代的神树、螺女、弓弩、伏羲女娲以及西王母、雉等画像,表面上体现了汉民间的财色信仰,实际上体现了远古婚姻由群婚到走婚再到夫妻婚制的演化过程。朱存明的博士论文《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汉墓形制体现了汉代的天圆地方观念,汉画像图式象征着汉代的天地人鬼的认知世界、宗法观念。

神话——文艺民俗学的研究范式。民间信仰中的偶像大多以神话的形式出现,所以在研究实践中,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神话的研究来揭示汉代民间信仰的特征。田兆元的《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一至十四章论述了汉代的祖先、谶纬、道教和佛教神话。王青的《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8月联合出版)描述并分析了两汉时期的国家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制度化历程,重点论述赤松子、王子乔、西王母、黄帝、老子等几个有代表性的仙真神祇个案。黄震云、孙娟的《汉代神话史》(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则梳理了汉代文学、著作、帛画、画像石中的神话传说。

(三) 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趋向

通观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大致上可以推测其未来发展的趋向。

其一,从研究的话题来说,思想史——哲学的研究范式将会加强。近年来的汉代民间信仰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史和美术史方面,其选题的重复和内容的重叠势必会激起研究者的哲学思考,进一步挖掘其内在的思想文化意蕴。葛兆光和张岂之的思想史研究扩展到知识和信仰的视域,可以说,代表了汉代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取向。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是葛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或是张先生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对于民间信仰话题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因为前者只是用了很少的篇幅,其他大部分章节还是落入经典文献研究的俗套;后者虽有所论述,只是作为秦汉思想史的社会背景来讲的。由此,在思想史——哲学的研究范式中深入探讨汉代民间信仰的丰富内涵,就成为汉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趋向。

其二,从研究的理论来说,汉代民间信仰的概念将会重新界定。近年来,民间信仰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成为学术的热点,但是究竟什么是民间信仰?其概念应该如何来把握?学者们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大体上说,将民间信仰看作民俗文化,与成熟的宗教相对称,这是没错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传统文化的宗教淡化、神怪多多的特征,这种认识就显得片面化;以此来探究历史尤其是汉代及汉代以前中国本土宗教尚未形成的民间信仰,就更不能准确地指导实际的研究。由此,高度抽象地来阐释民间信仰的意蕴,是进行民间信仰史研究的前提。而民间信仰概念的把握,应该充分考虑到几点:第一,是由民间而带来的民众、民俗;第二,是由信仰而带来的知识、精神;第三,是由民众精神、民俗知识所带来的社会思潮、社会价值观念;第四,是由此而折射出来的思想观点和宗教仪式。我们认为,民间信仰概念的理解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才能深入下去。

其三,从研究的资料来说,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需要重视图像资料的使用。汉代历史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传世文献比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春秋繁露》《论衡》《风俗通义》等等,二是出土的简帛资料如《居延汉简》《放马滩汉简》等等,三是汉代砖石画像。在实际的研究中,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资料为学者们所共同重视,而大量的图像资料只有艺术史和文艺学的研究者才使用。所以其结果是,美术史——文艺学的研究范式更贴近历史实际,而宗教史——宗教学研究范式、思想史——哲学的研究范式与社会史——民俗学的研究范式显得名不副实。葛兆光先生可能有鉴于此,在研究中采用了汉画像资料。但根据他所列出的“帛画与画像砖中的三个世界”小

标题和相关论述来看,葛先生可能尚未明白汉画像有砖、石、壁等等的分别。可见,采用汉画像资料来研究汉代民间信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最后,从研究的实践来看,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需要整体史观的方法。民间信仰虽然属于民众文化,但是它与社会上层的政治文化是相互对立、相互拥有、相互支配的。如果在研究中只考虑到民间性、民俗性,而不考虑它与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就不可能揭示民间信仰的社会历史本质。比如如果不考虑秦皇汉武的求仙活动,就很难把握汉代社会普遍存在民间的神仙信仰;如果不考虑王莽的借助于西王母来造势篡权活动,也不能理解当时民众普遍的西王母信仰。可见,探究汉代的民间信仰,不仅要考察汉代社会的一般民众生活,同时尚需要观照汉代统治者的社会活动及其精神导向对于民众活动的吸取和影响。如此,汉代民间信仰的研究就需要整体的史学方法,从社会的普通民众到上层统治阶级,从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从非理性的民俗活动到理性的制度规定,都需要整体上来把握。

● 汉画像的研究现状及其民间信仰性质

传世文献、出土简牍和汉画像是构成两汉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但是在现实的历史研究实践中,传世文献比如《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普遍受到重视和重用,而出土简牍则更得到史学家青睐,成为秦汉史研究的热点甚至可说是显学,只是大量的汉画像艺术资料却始终得不到史学家尤其是两汉史研究者的重视。在这里,笔者不揣冒昧,将出土的汉代画像艺术作为核心的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简牍资料,以汉代的民间信仰为话题,作一探索。

(一) 汉画像及其研究的现状

所谓汉画像,就是指汉代的雕刻和绘画艺术。汉画像的内容非常之丰富。依照汉画像所依存的材料来说,可以分为石画(通称汉画像石)、砖画(通称汉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瓦当画、铜镜画;以汉画像的功能来说,可以分为祠堂画、汉阙画、墓室画、棺槨画;以汉画像雕绘的技法来说,主要可以分为拟浮雕(包括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和圆雕)和拟绘画(包括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两类;依照汉画像画面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生产生活、人物故事、历史掌故、房阙庭院、神仙灵异、天文星象、逐魔打鬼;依照目前汉画像所发现和出土的区域情况,学术界一般划分为四个区域:以河南南阳为核心的洛阳、郑州、许昌区域,主要出土有石画、砖画、壁画;以嘉祥、徐州、淮北为核心的山东、

江苏、安徽和浙江区域,主要出土有石画、祠堂画;以巴蜀为核心的四川、重庆区域,主要出土石画、砖画、棺槨画;以吕梁、陕北为核心的山西、陕西区域,主要出土石画。

汉画像的研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有学者称之为“千年学术”,可以说名副其实。大致上,汉画像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两汉之后至晚清,可以说是汉画像研究的著录时代。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就有关于汉代武梁祠画像的记载。嗣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清代冯云鹏、冯云的《金石索》都有相关的记载。第二个阶段是晚清至新中国的建立,可以说是汉画像研究的被新学术所重视的阶段。五四之后的文史学者诸如翦伯赞、鲁迅、董作宾等给予汉画像以足够的重视,汉画像作为重要的艺术史资料和汉代历史资料得以保存和收藏,比如早在1935年在地方官员的关注下就建成了南阳汉画馆。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至今,汉画像特别受到关注,可以说是其研究的繁荣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汉画像资源发现更多了,这是因为在国家文物局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文物普查,使遗存在各地的汉画像砖石得到了相对确切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在汉墓考古中出土了大量的汉画像砖、石;二是汉画像博物馆的建立为汉画像的收藏和保护、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如除了南阳汉画馆得以重建,山东还建成了山东艺术雕刻馆、嘉祥武氏祠汉画馆、滕州汉画馆,江苏建有徐州汉画馆,安徽建有淮北汉画馆,萧山汉画艺术馆,等等;三是研究机构的建立和队伍的壮大,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汉画像研究机构,开设汉画像研究的学位点,一些导师不仅自己积极展开汉画像的研究,并招收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以专门研究汉画像。

迄今为止,汉画像的研究可谓是成绩斐然,但是问题也很多。就其研究的基本范式来说,主要限于考古学和艺术学领域。就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而言,其研究主要是汉画像的著录和画面内容的考释。著录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国画像石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以及四大区域相关的著录图册,比较全面反映了各地汉画像的基本情况。考释性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1. 信立祥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该书将汉画像分成墓祠、墓内、阙和岩画四个方面,然后分别予以论述。2. 王建中的《汉代画像石通论》,该书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按照西东两汉自然时间将汉画像各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期,又观照四大区域汉画像的特征,予以分别论述,属于比较典型的汉画像考古学专著。3. 李淦的《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该书选择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图像,专门予以探究,分析四大区域中西王母汉石图像以及铜镜、摇钱树上西王母图像的特色,总结西王母图像的艺术特征。4. 罗二虎的《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则是针对四川地区汉画像石棺作详细的考察。考古学研究的特征在于“其画面

的考释有余,而其内涵的解释则显不足”。就艺术学方面的研究而言,其主要的代表作有:1. 巫鸿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依武梁祠汉画像所处位置的不同,指出其象征着天堂、仙界和人世三个世界。2. 陈江风的《汉画与民俗——汉画像研究的历史与方法》,认为汉画像存在着三个世界:神祇所居住的天国世界、墓主人阴间的生活世界和魑魅魍魉与打鬼避邪的形象世界;正是这三者构成了汉画像的绮丽的艺术世界,艺术地再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时代精神。3. 朱存明的《汉画像的象征世界》,全面深刻地分析汉(墓室、祠堂鱼棺槨)画像中的宇宙象征主义。艺术学的研究虽然弥补了考古学“解释欠缺的不足,但解释的现代化往往忽略其历史特性,可以说是类比解释有余,探源实证不足”。由此可见,要使汉画像的研究深入展开,尚仰仗于历史学的介入。因为历史学不仅是“解释性的学问”,同时也是“实证性的学问”,对汉画像展开历史学的研究,将是推进汉画像研究的唯一途径。

实际上,一些史学家已经看到了汉画像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撰写《中国史纲》秦汉部分时,就把汉画像作为最新的历史资料加以重视,指出汉画像全面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面貌,是一部“绣像的汉代史”。再如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论及到汉代思想时,采用了马王堆帛画和汉画像的资料,由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学术说史》秦汉卷在谈到西王母崇拜时,也采用了铜镜和汉画像的资料。但是整个说来,秦汉史研究中,汉画像资料还没有如传世文字资料和出土简牍那样成为专门的资料来使用和研究,而只是作为前者的补充来使用的。此其一。其二,也有学者虽然使用了汉画像资料,但是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比如,将汉砖画像和汉石画像区别不开。

由此,笔者认为,要充分地使用汉画像资料研究历史,除了掌握汉画像的基本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前沿走势之外,最重要的是要选准汉画像史学研究的切入点。只有选准了正确的切入点,才能发挥史学的解释和实证功能,对汉画像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二)图像学研究的旨趣与民间信仰研究的本质

现代西方的图像学理论为我们如何正确地来选择汉画像的史学研究切入点提供了借鉴。现代西方图像学的创始人、20世纪30年代德国汉堡学派著名代表欧文·潘诺夫斯基指出,图像学的研究要关注三个层次,一层是所谓“前图像的描述”,即指图像所描绘事物的意义;二层是所谓“常规意义”,即指图像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三层是所谓“本质意义”,就是“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通俗地说就是文化精

神,或者说思想性。由此,图像学研究的宗旨就是关注艺术图像的思想旨归,而不是一般艺术家所讲究的艺术形式或艺术技法。彼得·伯克就指出,“‘图像研究者’一词往往用来指这样一类艺术史学家,他们把重点放在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即其中隐含的哲学或神学上”。^①由此,具体到汉画像的研究,我们也不能仅仅关注汉画像的雕绘形式和技法,而应该关注其所蕴含的思想旨趣上。由于思想内涵之丰富和广博,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毫无重点地论述汉画像的思想性,所以这里就删繁就简,以民间信仰为切入点,来观察汉画像艺术中的汉代社会民众的生活情趣,梳理其民间知识、信仰和思想的内涵。

所谓民间信仰就是指社会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精神欲求及其崇奉。作为学术概念,民间信仰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提出的。迄今为止,关于民间信仰的精确含义尚未有一致的意见,但顾名思义,其基本的规定还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民间信仰是与政府相对而言,属于民众文化层次的,是与主流政治观念有所不同而单独存在且有自己发展规则和发展趋向的精神价值欲求。其二,民间信仰是与宗教相对而言,属于前宗教或潜宗教状态的,是与有着严格教义教规的宗教有所不同的而为社会民众所普遍信奉崇拜的。其三,民间信仰是与精英思想相对的,属于普通群众的,是与理论化系统化的精英思想有所不同的但是又受其影响的、松散的、即时性的社会思想或社会思潮。在这里,如果说“民间性”和“前(潜)宗教性”构成了民间信仰的基本元素的话,那么,社会思想性(或社会思潮性)就是民间信仰的本质特征。因为民众的价值欲求和精神崇拜,不仅是民间信仰的基本内涵,也是社会思想或社会思潮的基本内容。就此而言,民间信仰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思想或社会思潮的研究。无疑地,我们对汉画像艺术中的民间信仰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汉代社会思想或社会思潮的断代史研究。

(三)汉画像的民间信仰性质

作为社会生活及其思想的载体,汉画像非常鲜明地体现着汉代社会的民间信仰性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目前已经发现的汉画像石墓中,能够明确确定其墓主身份的,大多无有官职和纪年,即使有官职的,其官职大多在两千石以下。如:

1. 在河南省唐河县湖阳发掘的冯君孺人石画汉墓,该墓榜题为“郁平大

^① [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2页。

尹冯君孺人”。说明“冯君生前的官职为郁平郡大尹，相当于太守一级的官吏”。^①

2. 山西离石马茂庄左表石画汉墓，有榜题“使持节中郎将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元异之墓”。这里的“中郎将秩比二千石”。

3. 陕西绥德苏家圪坨杨孟元石画汉墓，有榜题“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太守与大尹相同，秩二千石。

4. 河南密县打虎亭1号石画汉墓，发掘者考证为“弘农太守张伯雅墓”，秩二千石。^② 但是有学者考证为梁汉之际的宦官“大常侍”侯渊之墓。^③ 而“常侍”的俸禄也是“比二千石”。

5. 江苏邳县燕子埠缪石画汉墓，墓志石刻有“故彭城相行长史事吕长缪字……君以和平元年七月七日物故”，据《后汉书·百官志》封国之“傅”“相”，秩“皆二千石”。

6. 山东安丘董家庄石画汉墓，据考证为东汉末年曾任青州刺史的孙嵩，秩比二千石。

7. 长沙马王堆汉墓，2号墓出土印章“利苍”“软侯之印”以及官印“长沙丞相”，3号墓出土有封泥“利豨”。^④

8. 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汉墓，其墓主人“历任西河长史（六百石）、行上郡属国都尉（比二千石，实际仍然是六百石）、繁阳县令（秩千石），最后最高官职为护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⑤

除上述之外，古代文献记载的汉画像墓主人身份，也没有超出二千石的。如：九江太守司隶校尉鲁峻墓，秩二千石；荆州刺史李刚墓，卒于熹平元年，当时品秩为六百石；蜀郡太守属国都尉王子雅墓，秩二千石。^⑥

当然超出二千石以上官职的汉墓也是有的，如广州发现南越王墓，有云气纹饰；河南永城梁王墓，有四灵图像；江苏睢宁九女敦汉墓，据推测可能是汉代

① 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闪修山：《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研究补遗》，《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② 《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李宗寅：《打虎亭汉墓墓主人考》，《寻根》，1998年第1期。

④ 傅举有：《马王堆汉墓的墓主人是谁——马王堆汉墓墓主人讨论三十年回顾》，《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⑤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24、26期。

⑥ 《水经注·“济水”“洧水”》；《隶续》卷十七、十八；《金石录》卷十九；《山左金石志》。